

本刊简介

读者意见

我要投稿

主编信箱

联系我们

作者名 关键字

搜索>>

2010年 第6期

按期查阅>>

== 专栏查阅 ==

过往期刊

2009年 more >

• 第一期 • 第二期

2008年 more >

• 第一期 • 第二期

2007年 more >

• 第一期 • 第二期

友情链接

友情链接

[返回前页]

卡尔·施米特政治思想简述

作者/来源：张永会

卡尔·施米特（1898~1985），是当代最为卓越的公法学家和政治学家之一，同时又是一个备受争议的人物。从其踏入学界始，就处于论争的漩涡之中，其作品“播种和收获的都是敌对”{1}。从个人经历上讲，他一生历经威廉王朝、魏玛共和国、纳粹帝国和联邦德国，几十年笔耕不辍，在政界和学界都影响极大。投身纳粹后成为其“御用法学家”，也成了以后施米特研究的意识形态禁忌。纽伦堡审判虽得以幸免入狱，但被禁止从事教职。尽管如此，施米特还是通过其著述和交往圈子拥有了深远而广泛的国际影响，以至于被认为是自1945年以来，“在德国和外国大学里比他同时代任何一个教授都拥有更多学生”{2}的人，其影响跨越了不同学科和政治营垒。本文尝试从施米特政治思想的时代背景、方法论特色、政治观等方面对其思想进行介绍并作简要的评述。

一、西方的没落与德国的困境

在第一次世界大战之前，西方知识界整体上对世界历史持一种乐观的进步主义的心态。源于17世纪的进步观念——这一观念认为人类以线性方式从过去进步而来，现在仍在进步，而且还会向未来无限进步——在启蒙运动中成熟起来，而孔多塞则对进步观念进行了堪称经典的概括，他的进步观可以归结为六个方面：（1）进步发生于一切领域；（2）伸展于未来；（3）反对不可避免的毁灭以及与此相伴的悲观主义；（4）文明是可以无限完善的；（5）线性史观；（6）把未来看作是某些可以计算的不可避免的模式。{3}而在西方（主要是欧洲）的现实中，1848年革命后虽然有短暂的复辟，但是总体上资本主义的发展势头无可扼制，资产阶级议会政治逐渐确立，社会立法的实行改善了工人状况，欧洲工人运动的激进趋势得以缓和，阶级矛盾也大为减轻。在国际领域，虽然有一些国家间的战争发生，总体上，态势平和，各国之间穿梭外交不断，和平局势似乎可以维持。

然而表面的平静却掩盖了下面急剧翻腾的岩浆。第一次世界大战就是欧洲各种矛盾长期积压而爆发的结果。这次战争，不仅给整个世界造成了巨大的人员和物质的损失，而且对于盛行的进步观念也产生了极大的打击，伴随而来的是对欧洲文明优越性的深深的怀疑和悲观情绪的蔓延。1918年，斯宾格勒（Oswald Spengler）的《西方的没落》一书问世，引起了巨大的轰动。这本书的成功，在于他以犀利的笔触，表达了一种普遍的不安：在受到高度赞扬的西方文明里，某些东西已经腐朽了。与此相伴的是，与自由主义相对两种新的意识形态——法西斯主义和布尔什维克登上了历史舞台并且吸引了众多渴望变革的人们的关注和追随。

施米特思想形成并成熟的时期就处于这一重大的历史转折关头。作为一个学养丰富而敏感的知识分子，施米特感觉到了这一大变动时期所体现出来的欧洲知识传统的困境，而战后德国的政治处境更为他思想的转变提供了思考的背景和境地。总的来说，德国战后政治秩序不稳，社会混乱，党派林立而相互敌对，国家权威难以形成。这时，对政治本质究竟是什么的思考就成为必然而必要的事情了。

二、规范与例外

面对一战后世界发生的巨大变化和德国公共秩序难以确立的政治困境，施米特重新思考了法学前提，从而使自己的学术思路实现了根本的转变，从以前遵从新康德主义法学传统而转变到更根本的对于政治秩序与法律之间关系的深层思考上，从而确立了自己以“例外”挑战“规范”的思考路径。{4}

下面以其对主权问题的讨论说明这一论点。

一般来说，随着国家秩序的建立，国家的一切作为都是以法的形式表现出来的，按照纯粹法学的观念，“一种国家理论只有当其成为国家——法理论时，才有可能”，其结果就是，“所有法律皆是国家——法，因为，所有国家都是法治国”。{5}也就是说，从法学的角度看，国家不是与法律秩序并列或处于法律秩序之外的实在或想象出来的实体。国家就是法律秩序本身，它必须被视为一个整体。所以，国家既不是法律秩序的创造者，也不是法律秩序的来源。

施米特明确反对这种观点，施米特认为，“就像其他任何秩序一样，法律秩序也是建立在决断而不是规范之上”。{6}在谈到主权时他说，“不存在能够运用于混乱状态的规范。一种法律秩序生效的前提是必须存在一种正常状态，而明确决定这种正常状态是否确实存在者就是主权者”。{7}主权就是决定非常状态。而这种非常状态是无法预知因而也是无法以规范的形式加以规定的。在此种情况下，自由主义法治理论就不适用了，因为他们关注的是那些得到正式认可的东西，其余的都属于动乱之列，不属于法学所关注的范围。这种理论，一旦遇到极端状态时就会手足无措——因为，非常状态的首要特征就是不受限制的权威，它意味着终止整个现有秩序。施米特说，在此情况下，“国家仍然存在，而法律则黯然引退”。

施米特认为，人们无法预知一种紧急状态的确切细节，也无法说明在这种情况下会发生什么，尤其是在遇到极端紧急的情况并寻求如何消除这种情况时，更是如此。在此，宪法所起的作用最多也就是指出在这种情况下谁能够采取行动。而如果这种行动没有受到种种控制，或者没有像在法治国家宪法中那样受到种种监督和平衡的制约的话，谁是统治者（主权者）将不言而喻。他置身于正式生效的法律秩序之外，绝不属于这种秩序，因为正是由他来决定是否完全搁置宪法。施米特指责说，现代立宪发展的所有趋势均倾向于限制这个意义上的统治者。然而，“这种极端的状态是否能够从世界上根除，不是一个法理学的问题。至于某人是否相信或希望这种极端状况能够被消除，则取决于哲学、尤其是哲学——历史学信念或形而上学信念。”{8}

所以，一种关注现实生活的哲学不能逃避非常状态和极端处境，而是必须在最大程度上关注他们。……非常状态比规范更重要……更令人感兴趣。规范不能证明什么，而非非常状态却能够证明一切。在非非常状态下，现实生活的力量打破了那种经过无数次重复而变得麻木的机械硬壳。{9}

三、技术化与中立化时代

施米特强调极端、例外和紧急状态，不仅是对当时德国以至欧洲现状的反映，而且也是对欧洲精神生活核心领域变迁把握的结果，这就是他所谓的“中立化与非政治化”时代。

与海德格尔相比，施米特是从文化——哲学层面在20世纪20年代对技术性进行了最为透彻和明确的分析{10}。施米特认为，要了解我们所处的时代，首先必须对我们所处的文化和历史现状进行确实的把握。在施米特眼中，近代欧洲整个历史实际上就是一部世俗化的历史，从16世纪以来近四个世纪，经历了神学、形而上学、人文——道德和最近的经济四个阶段。每一个阶段都有一个中心领域，欧洲人在不同时期“从一个中心领域转移到另一个中心领域，形成了我们文化发展的一切均是这些阶段的成果”。{11}而这几百年从一个领域转移到另一个领域历史的发展，有一个始终起着关键作用的基本动力，那就是为自十六世纪以来纷扰不断的神学论证和宗教斗争争取一个消除了冲突的中立的领域，在其中可以通过辩论和交换看法而达成一致。这一努力在技术化时代得以实现，自由主义学说成了中立化进程的经典表述。

形成反讽的是，在这一中立化过程的辩证发展中，中心领域的转换却不断地创造出新的斗争领域。在这个起初被看作中立的新的领域中，人与人之间以及各种利益之间的对立空前地呈现出来，并变得日益尖锐。原因就在于技术，说到底始终只是一种工具和武器。他能够服务于所有的人，所以他从来不具有中立性。从技术本身产生不出任何的决断。

然而，这样的趋势所形成的经济——技术思维却塑造了大众的心理。施米特观察到，“在今天，工业化国家的大众依然依从于技术性这种麻痹人的宗教，因为他们像所有大众一样，寻求各种激进的结论，而且下意识地相信，人们可以在此找到追求了四个世纪之久的绝对的非政治化，普遍的和平便从这里开始。但是，技术性既能强化和平，也能强化战争，两者的机会相同，除此之外，技术什么也做不到。就此而论，无论是以和平的名义讲话，还是利用和平这类虚假套话，都不能改变什么。今天，我们已经看透了，大众意见的心理——技术及其如何利用各种名目和言辞的迷雾运转。今天，我们也可以看清那种玩弄言辞的隐秘的手段，懂得了人们以和平的名义来发动最残酷的战争，以自由的名义来施加最沉重的压迫，以人道的名义来制造最可怕的非人道。”{12}

所以，由技术时代所带来的人们所谓的“中立化”并不能带来真正的和平，原因就在于这样的时代，政治仍然不可消除。从根本上来说，政治乃是人类不可避免的命运。

四、敌友划分的政治与多元主义的国家

施米特之所以声誉鹊起或者说恶名昭著，正是因为他的《政治的概念》，而非别的什么著作。{13}在这本小册子里，施米特提出了他的政治就是划分敌我的著名论断，其本身就激起了仇恨和敌视。

然而，施米特所提出的政治的概念及其所坚持的政治的不可避免性，却构成了施米特政治思想的中心环节。他认为，与人类活动的其他相对独立的领域相比，政治也具有某种以自身特定方式表现出来的标准，这一标准独立于其他的划分，并具有自明性。这一标准就是朋友和敌人的划分。在这里，施米特明确指出，他并不是要提供一个无所不包的关涉政治本质的规范性定义，而只是提供了一个政治的标准。

施米特指出，敌人和朋友的概念，必须在其具体的生存意义上来理解。他们既非规范性对立，也非“纯粹的精神性”对立。“至于人们拒绝还是接受这种观念，甚或发现各民族依然按照朋友和敌人的原则分合聚散无非是一种远古野蛮时代的残余，均与我们此处的论题无关；至于是否有人希望朋友与敌人这个对立面最终从世界上消失，或者，推想世界上根本就不再有敌人是否过于学究气，均与此处的论题无关。”{14}施米特明确指出，他所关注的既不是抽象的理论，也不是规范化的理想，而是这种划分所固有的现实性和实现的可能性。

由于这种敌对的存在，就造成了随情境而产生的冲突的不同强度，政治性随对抗强度的增加而增加。而战争就是一种“最极端的可能性”，它具有一种特殊的决定意义，揭示了问题的实质。施米特强调战争的可能性，并不是说他就是一个鼓吹和热爱战争的人。他的意思是，在真正的战斗中，敌友的政治划分所产生的最极端后果才得以暴露出来。人类从这种最极端的可能性中发展出特定的政治紧张局面。作为始终存在的可能性，战争是典型的决定着人类活动与思想并造成特定政治行为的首要前提。从敌我对立和生存论的立场出发而导致的战争，是排除了正义与道德因素的。

与多元主义理论把国家视同于与其他社会团体一样的团体相比，施米特强调指出，国家是政治的统一体，它具有巨大的力量：发动战争和以国家名义安排人民生活的可能性。也就是说，它拥有战争法权，在特定情况下决定谁是敌人的现实可能性，以及运用来自政治的力量与敌人作战的能力。对政治也即对敌友判断的垄断，是国家区别于其他社团的根本性标志。

由政治的概念所得出的结论自然是世界的多元主义。因为，政治统一体以敌人的实际可能性为前提，因而与另一个政治共同体并存。所以，施米特总结：只要尚有国家存在，世界上就必然不会只有一个国家。{15}

“世界国家”之类的信念以及伴随而出现的后果，将会导致和平主义者“以战争反对战争”，以另外表现出来的政治的逻辑肯定战争，从而使之成为人类“绝对的和最后的战争”。这样的战争，由于带有所谓的“正义”、“和平”的面具，必然空前惨烈、毫无人性，因为一旦超出政治范围，他们必然在道德和其他方面贬低敌人，并且把他们变成非人的怪物。因而，对这种怪物就不仅仅是要加以抵抗，而且必须予以坚决消灭。换言之，敌人就不再仅仅是被迫退回自己的疆界而已。{16}施米特认为，这种战争的可行性恰恰说明了战争作为一种现实可能性直到今天仍然存在，这一事实对于认识政治至关重要。

为了说明政治的不可避免性，施米特转向了人类学，从人性即“人本质上是善的还是恶的”的角度来思考政治。施米特提出，所有真正的政治理论均假定人性“邪恶”，也就是说，人决不是一种没有任何问题的生物，而是一种危险的存在。施米特所有的政治判断和政治理论可以说都是建立在这一基本的人性论的基础之上。相反，自由主义理论却大部分推测人性为“善”。在这样的“乐观主义”思想模式中，必然会出现每一方均称自己拥有真理、至善和正义而导致最恶劣的敌意，最终导致一切人反对一切人的“战争”。这已经伴随着自由主义话语的强势而为世界历史和现实所证实，由此也证明了施米特思想的深刻洞见力和现实意义。

概而论之，施米特是反自由主义的，他的一生都投入了这一艰巨的斗争，始终是以一个战斗者的面目和自由主义的敌人而出现，虽然，施米特曾经在1945年夏以一种明显回顾性的自我审视语气，把自己描绘成一个沉思的精灵，而且，“一直喜欢成为一个辩护人而不是起诉者”。然而，实际情况却远非如此，施米特是一个技艺高超的“起诉者”，他的所有作品，包括政治的浪漫派批判、专政学说的演变、罗马天主教的当世权威性、主权、政治的神学观、政治的不可避免性等等，都是为了说明一个敌人——自由主义理论的当代无效性。而且，他对自由主义的批判是全面、彻底、系统的，包括了自由主义的政治哲学、制度形式和思维模式，并且在批判中建构起了自己对于实际政治的坚定立场。

然而，正如施特劳斯所说，“施米特是在一个自由主义的世界里承担起对自由主义的批判……，他对自由主义的批判发生在自由主义的视界之内，他的非自由主义倾向依然受制于无法克服的‘自由主义思想体系’”{17}，如上所述，他的思想中还有相当的自由主义成分。所以，施米特的自由主义批判是无法完成的。只有成功地突破自由主义的视界，才有可能彻底批判自由主义。

注释：

{1} 舒炜：《施米特：政治的剩余价值》，上海人民出版社 2002年版，第235页。

{2}{13}{17} 迈尔：《隐匿的对话：施米特与施特劳斯》，朱雁冰、汪庆华等译，北京华夏出版社 2002年版，第3页；第11页；第209页。

{3} 乔治·索雷尔：《进步的幻象》，上海人民出版社2003年版，第19~20页。

{4} 施米特论著英译版权管理人George Schwab介绍施米特的第一部作品名称就是The Challenge of Exception。

{5} 汉斯·凯尔森：《上帝与国家》，载刘小枫选编：《施米特与政治法学》，上海三联书店 2002年版，第327页。

{6}{7}{8}{9} Carl Schmitt. Political Theology[1934 edn], MIT Press: Cambridge, MA,[1922]1985, 第10页；第13页；第7页；第15页。

{10} John P. McCormick. Carl Schmitt's Critique of Liberalism: Against Politics as Technology. Cambridge: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1997, 第83页。

{11}{12}{14}{15}{16} 卡尔·施米特：《政治的概念》，刘宗坤等译，上海人民出版社 2003年版，第230页；第242页；第142页；第173页；第148页。

（作者单位：深圳市委党校 博士）

版权所有：中共深圳市委党校 粤ICP备05016979号